

海外存知己

梁子衡

僑務叢談之三

城闕輔三秦，風煙望五津；與君離別意，同是宦遊人。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；無為在歧路，兒女共沾巾。

王勃·杜少府之任蜀州

我想把「海內存知己」改為「海外存知己」來回憶我因公訪問亞、美兩洲幾個地區的華僑朋友和寫出我對海外華僑社會的一些觀感。

我參加海外工作大約分三個階段：第一階段是在中國國民黨中央第三組，屬黨務；第二階段是在行政院僑務委員會，屬行政；第三階段是在華僑救國聯合總會，屬僑運。

突破藩籬忘年論交

民國四十年、四十六年先後兩次訪泰是奉中央派任為當地黨務督導員；四十三年訪菲，協辦黨中訓練；四十九年訪越，是奉中央派任為當地黨務特派員。四十三、四十六、四十九年，我雖已在僑務委員會擔任處長和參事，但因為是擔任黨務工作，仍擬視它為第一階段；民國四十三年訪印（印尼）是奉命視察當地僑務，當屬第二階段；民國六十三年、七十二年訪美、加，當屬第三

階段。

第一次訪泰，欣幸結識了當地僑領雲竹亭、張蘭臣兩先生。泰國是黨國元老蕭佛成、蕭吉珊兩先生的僑居地。佛成先生是泰國的土生華僑，二十七歲便參加當地反清復明的組織「三合會」。當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創辦「中國日報」不久，佛成先生便在泰創辦「華暹日報」，桴鼓相應，倡導革命；隨後領導暹京「同盟會分會」，與胡展堂先生結交甚厚。佛成先生曾任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，以及第三、四、五屆中央監察委員，於二十九年辭世，我訪泰時僅見到他的公子蕭松琴先生。

蕭吉珊先生亦是在國內擔任過黨務要職的一位元老，當地僑社知識份子稱他為泰國「××頭」（指大陸時期一政治派系）。我到泰時，吉珊先生對他左右的人說，我是吳鐵老（鐵城）的「人」，似乎心存抵制。許多同志勸我不要見他，我却獨排眾議，抵步後三四天就往他的寓所晉謁請教了。他的態度冷漠，我告訴他，我到臺灣後才認識吳鐵老，我是中華民國的「人」，是中國國民黨的「人」。促膝談心之後，他竟留我用

餐，且有碗仔翅招待，事後同志知道了，都認為「空前隆重」。

我當時深痛「幫派式」政治對國家、對黨毒害之深，便一直重視「團結合作」以為自勉。李樸老（樸生）為我著的「思想方法」寫序，稱我為「打倒小圈子主義的梁兄哥」，大約他已看出我的個性了。後來，我隨徐晴嵐、崔垂言兩先生訪菲，徐、崔兩先生看見我與當地閩籍僑胞感情交融，認為我毫無地域觀念。

最近與徐晴公晤敘，他還告訴我，這個「打倒小圈子主義的梁兄哥」還成為我五十九年被中央遴為第六組副主任的主要條件呢。（當時徐晴嵐為主任）

官話聽得懂就是好

我訪泰兩次，第一次單槍匹馬以赴，第二次隨名學人黎東方教授、名聲樂家朱永鎮教授前往。後來朱教授在曼谷中華會館一場火災中罹難，中央即加派旅港音樂家黃友棟、陳世鴻兩教授來泰，繼續朱教授推動華僑青年音樂教育未竟的工作。這幾位學人，黎博士瀟灑、朱教授風流、黃

教授幽默、陳教授活潑，我這土佬形的年輕小伙子（當年還年輕，但不是才俊）伴着他們，真有點自慚落伍。

黎博士講「三國演義」，喜歡在講坊與學員座位之間走動，一口京片子，真是動聽。可是僑胞認爲我這四分四邑話、三分廣州話、三分國語的小子所說的「官話」比黎博士好（因爲他們聽得懂），氣得黎博士在中華會館的客廳裏直跺腳！

朱教授唱歌聲如洪鐘，他經常拿一把大「葵扇」上街，像一位「大媒婆」，目無「孺子」、「孺女」，超脫得像神仙。黃教授靜如處子，操琴（Violin）則如流水行雲，他這種成就，乃出於艱苦奮鬥，專心一致，難怪他自己說過，他的成功是因爲他一生只做一件事（音樂）。陳教授人瘦氣壯，高唱一曲，繞樑三日。我幸得以他們爲師，增加了不少知識，真不虛兩次訪泰之行。

當時，我駐泰外交官，有公使代辦的孫碧奇先生，有總領事孫秉乾先生，兩位後來都當了大使。孫公使極重儀表，我在泰時曾勸他多與僑胞、同志接觸，他就以「儀表」爲慮。孫總領事勤政愛僑，後來與我交往密切，成爲莫逆之交。

我兩次訪泰回來，有幾點不大成熟的觀感：

第一、我們要海外團結，中央必先團結。第二、要海外革命，中央必先革命（指有革命氣象、革命作風）。第三、中共以外交掩護僑務，我須以僑務支持外交。第四、要放眼天下，始能擁有天下，幫派式觀念作風，只造成幫派式爭權奪利。

「義統」促使華僑團結

民國四十三年，我隨同何宜武、陳以令兩位先生訪問印尼。當時，何先生任僑委會第三處處長，陳先生任中央黨部專門委員（或秘書），我任僑委會第一處處長。何、陳兩先生清瘦，我比較胖，經菲律賓賓時，當地報紙擇肥定位，稱我爲團長，好在我們只見過我駐菲陳質平大使、周書楷公使，而沒有見過新聞記者，否則，我就難脫冒充團長之嫌了。

印尼與泰國不同，泰國「兵」多「將」少，印尼「兵」少「將」多。當時留在印尼候命的外交人員有蔡維屏先生（現任大使）、朱昌東先生。在印尼從事新聞文教工作的有馬樹禮、吳慎機、丘正歐、徐琚濤、朱恕等先生，將星雲集，記不勝記。

當年印尼僑社有一特點，就是團結。分則各站崗位，奮鬥努力；合則一團和氣，視若家人。我記得在雅加達時曾患感冒，承馬樹禮先生招呼在其府上養息一週，至痊癒方始搬出，關愛之情，畢生難忘。

馬樹禮先生旅印尼時已是我國的立法委員，他後來擔任中央第三組主任（現海工會）、駐日代表，及升任爲中央委員會秘書長，出於他個人學識才能的條件固多，而與印尼僑社一團和氣的環境亦有關係，因爲只有諧和的環境才能養成領導人物的識與量。

泰國的華僑領袖多是「魯肅型」，印尼的華僑領袖多是「趙子龍型」。我們三人週旋於衆將星之中，工作謹慎，不敢輕忽。我們會開玩笑的作一分工：宜武先生國語好、學識好、人緣好，

推他代表致詞；以令先生那時能喝幾杯，推他代表飲酒；我肚皮大，被推代表吃飯。

訪問印尼由於時間很短，印尼是一個由羣島連成的國家，政治、社會的意識溝通不易，故國家中政黨多、意見多，大鬧小吵的事件亦多，我旅印尼華僑的處境也相當困難，雅加達的「紅河」就是我們僑胞的血染成的，近年排華事件的不斷發生，也是製造「紅河」的印尼暴徒鬼魂作祟！由於當地排華風氣較濃，促使很多「義」字標幟的僑團產生。那時，我就萌生「法統」、「道統」、「義統」在政治、社會上作用各有不同的觀念，直至年前在拙著「僑務文化觀」中，才把這些觀念提出，以就教於社會人士。

我認爲，「法統」、「道統」維持着一個國家，而「義統」則維持着海外華僑社會。義的範圍極廣，作用極大。我們中國宗親，不限於一姓，家庭不限於血統，同鄉不限於地域，浩如海洋，氣象萬千，這都是「義統」的精神表現。

中共爲貫徹其統戰陰謀，企圖以嚇、拆、騙手段在海外爭取或擊潰華僑組織，而始終無法得逞，主要是它無法打敗僑社的「義統」！

「法統」屬於政治；「道統」屬於文化；「義統」是屬於國人經文化長久磨鍊而成的一種民族精神。「義統」似乎是由下昇華而上，由基層發展到高層的一種道德結構。

在華僑社會，「義統」比「法統」更受重視。

自知享受厚奉祖宗

記得當年在杭立武大使由泰調菲，及政府發

表劉馭萬先生使泰、梁序昭先生使韓的時候，我曾在華僑日報「秀阿專欄」這樣寫過：「菲律賓僑社『將帥』多於『士兵』，杭先生在泰將『兵』的方法未必適用於菲律賓僑社；泰國僑社『士兵』多於『將帥』，劉先生有無興趣和精神在當地僑社走羣衆路線，似成問題；韓國僑社『地區』單純（大多爲山東籍僑胞），『人事』複雜，梁先生應感恩並施，軟硬兼用。」

菲律賓僑社跟印尼僑社一樣，將多兵少，而且菲律賓僑胞因經過武裝協助非國抗日的緣故，第二次大戰後，出現許多「將軍」，間有印發名片以光宗耀祖。四十三年我追隨徐晴嵐、崔垂言兩先生赴菲，協助中國國民黨駐菲總支部辦理黨員訓練，徐先生講授大陸匪情，崔先生講授三民主義，我講授華僑組織。我們抵菲之初，總支部正在舉行代表大會，改選委員，一連兩天，我們在酒店不動，連總支部會場亦不踏入半步。徐、崔兩先生深感詫異，委婉問因。我說，菲律賓同志非常敏感，我不想讓他們誤會我們三人到此幕後安排「人事」。大會結束了，黨部的同志湧到酒店來，熱情招待，視我們爲「君子」，我們便知道幾天來冷靜沉着的态度，已收到效果。

我講述華僑組織有幾個觀念：一是海外華僑組織是服務性、互助性，而非權力性；二是海外華僑組織只有工作的連繫，而沒有上下的隸屬；三是海外華僑組織是以無數點拱衛一中心，而非一中心領導各個點；四是海外華僑組織精神開闊而不狹隘，有如北平的深院大宅，探望門首甚窄，進門之後則庭院廣大，亭臺樓閣，美侖美奐，

有海闊天空的景象。

我選判斷海外華僑組織將日趨變化，一是在世界第二次大戰後，許多國家都走福利路線，因而帶動民衆組織亦走福利康樂路線，戰後扶輪社、獅子會、青商會之蓬勃發展，即其一例。一是海外華僑組織因受國內政治的影響，將由單純趨於複雜，由安定趨於動亂，終有一天會被迫在極權與自由之間作一選擇，我們必須加強僑團本身的民主教育，以堅定反共立場。在三十一一年後的今天，我們已看到海外華僑組織職應上的困難了，希望我有幸而言不中，不會見到海外僑社遭受中共政治侵擾的災殃。

我在菲講述華僑組織，曾獲得一個印證。這是一次余氏宗親會設宴歡迎徐晴嵐先生。徐先生以他是有雙人的徐，而非無雙人的余，恐僑胞弄錯，在餐會時發生尷尬，要我與當事人連絡，告知他們是徐而不是余。余氏宗親會的主辦人答得極爲爽快，他們說，徐與余同半邊，半邊相同即是宗親，這和海外僑胞伍（五）、陸（六）、漆（七）聯合懇親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不懂中國文化與「義統」的人，對僑胞此種「四海一家」的精神，真會有「莫名其妙」之感。訪菲之行，我有三大發現：首先是當地設有規模頗大的華文大學中正學院。我旅菲華僑文化組織，並每年邀請國內名學人赴菲講學，傳授中國文化。我深深認識到我旅菲華僑重視吸收知識，也重視傳授知識。其次，當地僑領極爲富有，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，僑社像一間辦筵席的酒樓，經常喜氣洋洋，我深深認識到旅菲華僑會賺錢，也會花錢。

再其次，當地的華僑義山，建築堂皇，有如巨室華廈，而成爲當地的一景，我深深認識到旅菲華僑知自身的享受，亦知對祖宗的供奉。

冒牌鐵嘴醉倒酒仙

我於民國四十九年訪越，那時，華僑還懷着當年被迫入籍的民族幽怨；亦還滿懷越共南侵的戰禍憂慮。吳廷琰的宮廷式民主政治，也正腐爛着越南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。

我抵達西貢的翌日，我駐越大使袁子健先生在官邸設宴招待，賓客甚衆。那時，當地僑社對我大使館發生了一些誤會，官民感情頗有距離，袁大使深有不能久留之感。他和我在臺北早已認識，曾耳聞我爲一「名相士」（其實是別人造謠的），乃誠懇要我替他看看氣色，近期會不會「丟官」。我在酒醉飯飽之餘，正感謝主人厚情，那會「出口傷人」？乃鄭重告知，大使方面大耳，職位穩如泰山，絕無問題，後袁大使平安無事，一帆風順，乃到處稱我爲「鐵嘴」。另有一趣事，我本不會喝酒，一天，王化行（昇）將軍因公到越，宴請當地一政府首長（忘其職銜），邀我作陪，並聲明參加者必須「不醉無歸」，到宴會時大家便「磨拳擦掌」，準備與主客一決雌雄。酒過二巡，我奉命打一通關，拿破命白蘭地十二杯，談酒色變，惟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我拚命過關之後，已天旋地轉了。我硬撐回到金陵旅店，昏暗中似有人入室，大叫「梁子健死了沒有？」使人啼笑皆非。此後「鐵嘴」之外又加上「酒仙」之名。「真名」真是得來不易！（未完）